

我想象中的孔夫子

EL CONFUCIO EN MI IMAGINACIÓN

孔子是什么样的？可能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孔夫子。在2013年第八届孔子学院大会期间，莫言先生应邀做文化讲座，当莫言的身影出现，现场响起了阵阵掌声。在代表们充满期待的目光中，这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侃侃而谈，从孔子、孔子学院说起，用幽默的话语分享了自己对文化、社会和生活的思考。

孔子学院的大会，我早有耳闻。我想在全中国的教育界或者是汉学术界也都知道这个大会。我经常坐车路过德胜门，看到过孔子学院那个巨大的招牌，也远远地看见过那栋方方正正的像孔子的面孔一样的大楼。

国家汉办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在全世界开创了440所孔子学院，还有646个孔子课堂。这个干劲可是比孔夫子当年大多了。孔夫子折腾了一辈子才3000弟子，里面只有72贤人，而且到处流浪。我到过5所孔子学院。孔子学院以传播博大精深中国文化，以增进各国人民对中国的了解，为加强世界的和平、促进世界人民的团结做出了非常令人叹为观止的贡献。

我觉得孔子学院的大会让我联想到金庸笔下武侠小说里面的武林大会，那些武林大会都是武林当中江湖上的高手云集在一起，要比试武艺，要选出一统江湖的盟首，都是大打出手，血流成河。但不同的是，孔子学院大会是汉学盛会。大家奔着孔夫子的“和为贵”精神，贯彻孔夫子的“有教无类”教育思想，实践孔夫子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治学方法，汇聚在一起交流经验，联络情感，加深了解，增进友谊。

三天前，我参加了汉学家与中外文化交流座谈会，做了10分钟的发言。言犹未尽，今天接着讲。我主要想讲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是研究中国应该具备一种历史的角度。

从我亲身经历的一个故事说起。前几年我回山东高密去为我的父亲做寿，整个家族几十个人都参加了。我父亲说他一辈子经历了很多的时期，他认为最近十几年，是他这一辈子中所过生活最好的一段时间，过去从来没有想到能过上今天这样的日子。他总结说“高密感谢吴建明”。吴建明是高密市当时的市委书记。他为什么要感谢这个市委书记吴建明呢？因为他解决了高密人的饮水问题。高密这个地方水含氟量很高。高密人在北京、上海认乡亲的重要标志就是一张嘴看到黄牙。仅仅牙黄无所谓，饮用水含氟高了以后会使骨骼变得脆弱。吴建明在两年之内把自来水通往高密的千家万户。

这件事情当然也是他应该做的，也是每一个地方的政府应该做的。但他的许多前任都没有做。我父亲的这两句话非常纯朴。但是几个本家的年轻人发表了跟我父亲完全不一样的观点，他们说，感谢什么，一群贪官污吏嘛。

这个事情让我认真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我父亲跟我的侄子们会对当下的社会做出这样完全不同的两种判断呢？就是因为他们考察现实的方法不一样。我父亲他是1923年生人，他是拿他过去经历过的时代跟眼下的生活进行比较。他经历了战争、饥饿、一场又一场的政治运动，他们

这一代人是真正的饱经苦难。当他现在看到自己家里衣食无忧，温饱早已得到了解决，社会也非常安定，不要交农业税了，还给你钱，种小麦、种棉花还给你补助。他得出这个结论是发自内心的。我父亲考察现代社会或者给当下的社会做判断，他是有历史的角度在里面，他是纵向地比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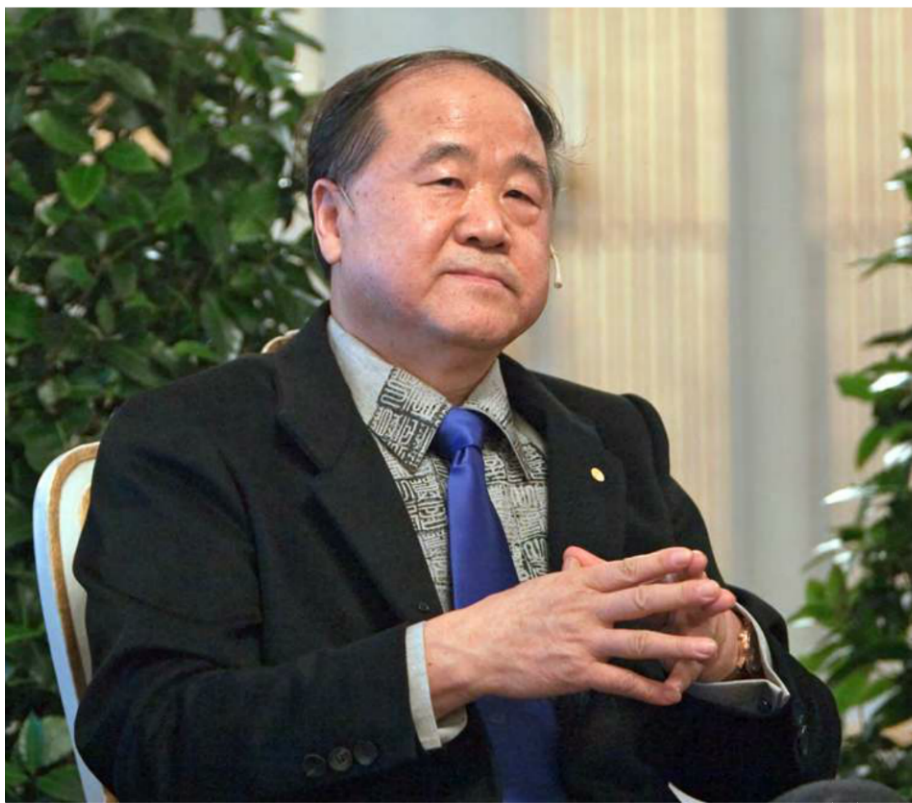
我这些侄子们，他们都是“80后”，生下来以后就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他们只是横向地比较，他们看到有一些没有他聪明的人比他混得要差，有一些工作不如他勤奋的人发了财，他就感觉到眼下这个社会是很不公平的。

从这两代人，或者说从这两种观点里面，我感觉到无论是研究什么问题，研究中国的任何问题，无论是现实的，还是思想文化方面的，都应该有一种纵向比较的角度在里面，也还应该有一种横向的比较在里面。

历史的观点和现实的观点，纵向的比较和横向的比较，形成一个焦点，这样就可能得到一个对你要研究对象的比较公正、客观的评价。

我想讲的第二个问题就是研究中国问题应该引入一种比较的方法。

在前几天的汉学家座谈会上，我跟来自哈萨克斯坦自然科学院的院士克拉拉女士坐在一起。她跟我讲她现在下乡去看公路两边的很多农田荒芜了，看到草原上没有成群的牛羊，她心里很难过。因为很



多年轻人都进城了。她为她的国家目前的状况深深担忧。我对她说，实际上你们国家存在的现象最近几十年来在中国普遍存在，直到现在依然存在。我想这可能是社会改革变化发展过程中要出现的必然现象。我对她说，正是因为你所在国家也存在着跟中国类似的现象，所以你对中国进行研究的时候就可以推己度人，以中国的老话就是以“自心比人心”，这样，对研究的对象就有一种尊重的态度、理解的态度，因为大家都差不多，无论哪种社会制度下哪个国家的人，基本感情还是相通的。我想这也是我们的文学艺术或者其他艺术具有世界性的最深层的原因。

一部文学作品只有表现了人类的最普

历史的观点和现实的观点，纵向的比较和横向的比较，形成一个焦点，这样就可能得到一个对你要研究对象的比较公正、客观的评价。

遍的最基本的感情，然后翻译成外文之后才可能打动外国的读者。一个艺术作品也只有表现了人类最基本的感情之后也才能够感动其他国家的观众。我们的汉学教育

实际也是这样。只有把我们最基本、最符合人的基本情感的东西拿出来率先介绍出去，可能更能赢得其他国家人民的认同。

在研究的过程中，或者是在进行其他工作的时候，都是应该有一种比较的观点。无论是从政治的角度、意识的角度、文化的角度，最好就是研究者应该把自己放进去，研究者应该把自己的生活放进去，研究者应该把自己国家的情况放进去，与你研究的对象进行比较，由此得出一种更深的更准确的理解。

孔夫子还讲过一句非常好的话，叫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觉得现在要特别强调，当下这个时候“己之所欲，也不要强加于人”。我们过去总是觉得我先进，你落后，我文明，你野蛮，我就把我的先进和文明强加给你，这就是一种很好的符合国际惯例，也符合道德水准的事。

但是，从文化的角度来考量，确实有很多事情很难用先进与落后、文明与愚昧来衡量。因为一种特殊的文化产生，往往是跟其当时的社会环境以及跟当地的其他所有因素结合在一起。所以这种把自认为是先进的、是文明的东西强加给别人的做法，我觉得不能适合这个社会。因此，就是应该在孔夫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基础上，再引申一步——“己之所欲，也不要强加于人”。

我讲第三个方面的问题是研究中国社会应该具有发展的眼光。

今年春天，前德国驻中国大使施明贤在一次宴会上问我一个问题，他说：“莫言先生，根据你们中国政府的设想，到了2050年，中国基本上可以建成一个现代化的强国。但是，那个时候中国的贪污腐败问题、贫富悬殊问题、环境污染问题将会变得更加地严重，甚至会变成摧毁这个社会的导火索。对此，你有什么想法？”

我觉得他问了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我觉得他不应该把这个严肃的问题问我一个作家。不过既然他问了，我还是要回答，不能白吃他的饭。

我说，从现在退回去 37 年是 1976 年，那个时候我是一个青年，我当时最浪漫的一个梦想就是我什么时候能够由农村户口变成城镇户口呢？我什么时候由农村进入城市？但是现在，要想进城市，谁都可以进。

我有一个堂叔在台湾，就是因为这样一个关系，我从 1974 年，连续三年报名应征入伍都无法通过政审。现在去台湾变成了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你只要报一个旅游团就可以去旅游。那时候北京有一条禁令，叫做“不准围观外国人”。现在的北京，外国人太多了。那个时候我们看到一辆吉普车，就会跟着追，终于开了眼界了，现在任何一条胡同里都塞满了轿车，车辆之多以至于变成了社会公害。

那个时候，我们村里的一位年轻人去过一次青岛，炫耀了十几年。每次坐下来说三句话，他就说我去过青岛，青岛有多少站，青岛的公共汽车是什么样的，青岛的树冬天还长绿叶子。现在我们村里很多年轻人都在中东地区打工。

我对他说，37 年前，想象不到 37 年后的中国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下一个 37 年以后，大使先生担心的问题也许根本就不存在了。我们应该相信过去 37 年内创造了令世人惊叹的奇迹的中国人民，在未来的 37 年里也会创造出更辉煌的奇迹。并且会解决很多现在看来似乎难以解决的问题。我看到史明贤大使点了点头，我也不知道他是被我说服了还是没有被我说服，反正他不再提这个话头了。我觉得我说的也是真话。

我们试想中国的未来，看中国的现实，



纳尔逊·曼德拉 Nelson Mandela

都应该用一种发展的眼光。只有用发展的眼光，才可以保持乐观向上的精神，我们才不会被眼前的很多难题所困住、所沮丧并失掉我们奋斗的力量。

还有一个简单的例子，前不久我去云南参加第 13 届亚洲艺术节。在这期间我得到了一个很珍贵的礼物，就是一个影碟。影碟上记录了 1957 年云南的几个很小的少数民族的生活状况。他们那个时候还过着刀耕火种的生活，住着简单的茅棚，他们没有自己的文字，整个社会的形态似乎还处在原始社会的末期，还是群婚制，还是母系社会。而且还有一个非常野蛮的习俗，就是每年到了祭祀之前，这个部落里的男子都要出去砍人头。如果谁能够砍下来一个长满了络腮胡的人，他们就是部落的英雄，因为络腮胡象征着繁茂，预示着来年的大丰收。不过 50 多年之后，现在这个少数民族已经跟我们的社会发展同步，完成了数千

年的社会演变和进化。在我们当今这个世界上，由于文明，由于科学，由于各种各样的进步的力量，会产生很多社会进化方面的奇迹。当然，有人说为什么不保持原来的社会现状呢？可以让我们去参观。但我想，这种说法，有胡子的男人是要坚决反对的。当然这是开玩笑。这样真实的事例都会令我们感慨万千，人类社会确实存在着奇迹，我想这样一种生动的事例，实际上也可以成为我们孔子学院对外介绍中国的素材。

最后，我想回应一下我原来拟定的题目，就是“我想象中的孔夫子”。我曾经参观过山东曲阜的孔庙、北京的孔庙、云南昆明的孔庙，浙江衢州的孔庙，还有台湾台南的孔庙，这些孔庙里面都会悬挂着孔子的画像或者是孔子的塑像，无论是孔子的画像或者是孔子的塑像，这个孔夫子都是有着一个方方正正的脸盘，有着长得有一点夸张的眉毛，有一

个塌塌的鼻子，有一个方方的嘴巴，而且有很大的门牙，两个门牙之间有一条宽宽的缝隙，是这么一位老人。这种形象给人一种古板、方正的感觉。真正的孔夫子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我通读了几遍《论语》之后，就感觉到孔夫子不应该是我们的孔庙里面所悬挂的画像或者是所矗立的塑像那种样子。那么孔夫子的形象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从《论语》来看，孔夫子毫无疑问是一个有梦想的人。现在不都提倡中国梦吗？孔夫子就有梦，他的梦想就是按照《周礼》的规定建设一个像西周那样的国家。但是在当时，这个理想有点不切实际，好像是倒退。但他也说过，他的理想就是让“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就是让老人安康舒适，让朋友们互相信任，让小孩子得到关怀和爱护。他这种社会理想很实际，在现在也符合很多人的想法，包括我们政府的很多想法——老有所养、少有所爱、人人与人之间和睦团结。但是，我想在那个时代，孔夫子这种理想，即便是恢复了周礼也未必能实现。另外，孔夫子也提倡复旧，要克己复礼。但在现实生活中，我觉得根据《论语》的记载，他实际是一个随机应变的人。有的时候他很实事求是，他读《易经》读到韦编三绝。《易经》就是讲变的书，就是讲一切发展、一切力量都在变化当中，世界上的任何事务不可能永远不变化，只有适应变化，只有积极地求变，人类的发展才能进步。

孔夫子既然把《易经》读得“韦编三绝”，就是捆住竹片的牛皮都断了三次，他当然是深刻领会了《易经》的精神。所以，他对社会的评价，对人的评价是非常灵活的。他曾经提醒过管仲，希望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希望下级服从上级，臣子服从帝王。管仲当时应该是背叛了自己原来的主人，辅佐了齐桓公。当有人问到管仲这样做是不是符合“仁义”的规定呢？



孔夫子讲当然符合了。他协助了齐桓公一匡天下，老百姓生活得到了改善，这是很大的仁义。我觉得孔夫子对人的评价，对事实的评价，实际是非常灵活的，并不是拘泥于陈规陋俗的人。

我读《论语》，感觉到孔夫子也是很活泼的人。《论语》里面很多次提到他唱歌。他听到人家唱歌觉得好听就让人家再唱一遍，他就能唱出来，听两遍就能学会一首歌曲。实际上他是一个音乐天赋非常高的人，他应该是一个歌唱家或者是音乐家。一个善于唱歌、喜欢交友的人，怎么是像我们在孔庙里面看到的那样一个老头呢？他应该是一个非常活泼的人。

总之，我觉得孔子也充满了幽默感，很活泼、很幽默，他绝对没有像我们在庙里面看到的那样庄严、神圣。他就是一个跟我们差不多的人，只不过他比我们在各方面要优秀一点。所以我们在孔子学院对外推介孔子的时候，希望也不要把他说是一个神，把他说成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这样更有说服力。

至于孔夫子的相貌，也有很多说法。我这两天在想，孔夫子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呢？《史记》里面说他生下来头脑上面有一个很深的凹陷，所以起名叫丘。也有人说他是大奔儿头，也有人说他是很大的耳朵，也有人说他是上身长，下身短，很多大人物都是上身长、下身短。关于孔夫子，也有人说他是身高9尺6寸，折合到现在身高是1.91米，完全可以打篮球了。我觉得孔夫子的形象就是一个大家谁也说不清楚的形象。我们老想从现实生活中找到一个人，看看他能不能跟我想象的孔夫子差不多。

最近几天，我突然感觉到有一个人很像孔夫子，那么他是谁？我觉得他就是刚刚逝世的南非总统曼德拉。■

（根据现场录音整理）

¿Cómo era realmente Confucio? Quizás, mil lectores se imaginan mil maestros Confucio. Durante la octava edición del Congreso Mundial de los Institutos Confucio 2013, el Premio Nobel de Literatura, Mo Yan, pronunció un discurso cultural en el acto de clausura. Al subir al escenario se escuchó un cálido y prolongado aplauso. Frente a las miradas expectantes de todos los asistentes al congreso, el escritor chino habló con naturalidad sobre Confucio y sobre el Instituto Confucio, y compartió con la audiencia su pensamiento sobre la cultura, la sociedad y la vida.

Hace tiempo que oí hablar sobre el Congreso Mundial de los Institutos Confucio, conocidos en el círculo educativo y académico de China. A veces paso por la Puerta Desheng y veo el cartel de la Sede Central del Instituto Confucio flanqueando ese enorme edificio que asemeja el rostro del propio Confucio. Además, soy conocedor del encanto y del espíritu pionero de la directora Xu Lin.

En menos de diez años se han establecido en todo el mundo 440 Institutos Confucio y 646 Aulas Confucio. El éxito conseguido es mayor que el obtenido en su tiempo por el propio Confucio, pues en toda su vida el número de discípulos alcanzó unos tres mil, de los cuales sólo 72 destacaron sobremanera. Desde su creación, he visitado cinco Institutos Confucio en distintos lugares del mundo. Estos centros educativos tienen el objetivo de difundir la cultura china para que los extranjeros la conozcan bien, además, han hecho una gran contribución a la hora de mantener la paz mundial y fomentar la unión universal.

A mi entender, el Congreso Mundial de los Institutos Confucio es como la cumbre de las artes marciales aparecida en una novela del gran escritor Jin Yong, en la cual los mejores maestros se reúnen para intercambiar experiencias y métodos didácticos, lo que fomenta el conocimiento mutuo y se logran grandes avances.

Hace tres días, asistí a una conferencia sobre el intercambio cultural entre China y el extranjero. Ahí pronuncié un discurso de diez minutos que no me satisfizo. En el discurso de hoy quiero hablar desde tres aspectos. El primero de ellos se inspira en la idea de que para conocer bien China hay que indagar en la perspectiva histórica.

Hablo desde la propia experiencia. Hace unos años, volví a Gaomi, mi pueblo natal en la provincia de Shandong, para celebrar el cumpleaños de mi padre, quien me dijo que durante su vida había experimentado muchos períodos distintos y que sus últimos años eran los mejores. Nunca imaginó que pudiera tener una vida tan buena como la que goza en la actualidad. Así me confesó que China “ha de agradecer al Partido Comunista, mientras que el pueblo de Gaomi debía dar las gracias a Wu Jianming”. Se refería al secretario del comité de Gaomi en aquel momento. ¿Por qué le quería dar las gracias? Porque Wu resolvió el problema del abastecimiento de agua para sus ciudadanos. En Gaomi el agua contenía una alta densidad de fluoruro. Una de las consecuencias de beber este agua era que los dientes se volvían amarillos, lo cual hacía que sus habitantes fueran fácilmente reconocibles en Beijing o en Shanghai. Además tenía otra consecuencia todavía más grave: los huesos se hacían frágiles. Fue Wu Jianming quien logró traer el agua corriente a las miles de casas de Gaomi.

Él simplemente hizo lo que tenía que hacer, sin embargo, ninguno de sus predecesores remedió el problema del agua. Las palabras de mi padre eran muy simples, aunque no contentaron a unos parientes jóvenes que dijeron: “No hay nada que agradecer, solo son funcionarios corruptos”. Este asunto me hizo pensar. ¿Por qué dos generaciones

de una misma familia tienen opiniones tan dispares? Lo que ocurre es que tienen diferentes maneras de examinar la realidad. Mi padre nació en 1923, así que compara su vida actual con la que tenía en el pasado. Experimentó la guerra, el hambre, diversos movimientos políticos, etc. Su generación sufrió mucho. Ahora ve que se puede comer bien y vivir cómodamente, que la sociedad es estable. No hace falta pagar impuestos, incluso te conceden subsidios para el cultivo del trigo y del algodón. Mi padre lo que hizo fue hablar desde el corazón y examinar la sociedad actual desde una perspectiva histórica, haciendo una comparación vertical.

Por su parte, mis sobrinos, nacidos entre 1980 y 1989, han conocido siempre una vida relativamente fácil y sin preocupaciones, por lo que su comparación es horizontal. Existe la paradoja de que algunas personas menos inteligentes que ellos tienen mejores trabajos, mientras que otros más vagos en el trabajo se hacen más ricos. Todas estas cosas en sus ojos reflejan la injusticia de la sociedad contemporánea.

Estos dos puntos de vista generacionales me hacen pensar que cuando se realiza un estudio sobre China, realista o ideológico, se tiene que hacer también una comparación vertical y horizontal.

La opinión histórica y realista forma, junto con la comparación vertical y horizontal, un único foco. De este modo, es posible conseguir una valoración más o menos justa y objetiva sobre el tema de estudio.

El segundo aspecto del que quería hablar se refiere a que para estudiar China hay que introducir un método comparativo.

En una conferencia de sinología celebrada hace unos días, me senté junto a un miembro de la Academia de Ciencias

SÓLO SI UNA OBRA LITERARIA REPRESENTA EL SENTIMIENTO MÁS COMÚN Y MÁS BÁSICO DE LOS SERES HUMANOS, SE PUEDE EMOCINAR A LOS LECTORES EXTRANJEROS DESPUÉS DE SER TRADUCIDA. NO IMPORTA SI LO HACEN DESDE UN ÁNGULO POLÍTICO, IDEOLÓGICO O CULTURAL.

Naturales de Kazajstán llamada Clara. Me comentó apenada que cada vez que veía campos abandonados a los lados de las carreteras o praderas sin rebaños de ovejas se sentía muy triste. Esto es consecuencia de que muchos jóvenes emigran a las ciudades para trabajar. Estaba muy preocupada sobre la situación actual de su país. Yo le dije que este fenómeno se viene dando también en China y que en la actualidad es todavía más persistente. Creo que se trata de un hecho inevitable que aparece durante el proceso de desarrollo social. Aprovechando que ambos países sufrían el mismo problema, le comenté que sería bueno hacer una comparativa. De este modo, se obtiene una actitud comprensiva y de respeto sobre el objeto de estudio. Porque no importa qué tipo de sistema social tienen o de qué nacionalidad se trata, las personas comparten entre sí sentimientos básicos. Creo que esa también es la razón esencial y profunda por la que nuestra literatura, o cualquier otro arte, contiene ese carácter mundial.

Sólo si una obra literaria representa el sentimiento más común y más básico de los seres humanos puede emocionar al lector extranjero después de ser traducida. Lo mismo pasa con cualquier obra artística. En realidad, también se puede aplicar a nuestra educación sinóloga.

Un estudio u otros trabajos similares deben de tener siempre un punto de vista comparativo. No importa si se hace desde un ángulo político, ideológico o cultural. Lo mejor es que el investigador se ponga como ejemplo y hable de su vida o de la situación de su país en el estudio y realice la comparación con el objeto en cuestión. De este modo, se puede conseguir una comprensión más exacta y más profunda del tema.

Confucio dijo en una ocasión una frase muy famosa: “No hagas al prójimo lo que no quieras que te hagan a ti mismo”. Creo que ahora es el momento de enfatizar lo que uno quiere sin imponer nada a los demás. En el pasado ocurrieron muchas cosas de este tipo. Si pienso que yo soy más avanzado y tú más retrasado, yo más civilizado y tú más salvaje, impongo mi civilización y mi cultura sobre la tuya, lo que corresponde a los estándares internacionales sobre moral.

Sin embargo, cuando lo analizamos desde una perspectiva cultural, existen muchas cosas de las que no se puede decir si son avanzadas o atrasadas, si son civilizadas o salvajes. Por lo que el nacimiento de una cultura especial siempre enlaza con el ambiente social de ese momento y con otros factores locales. Por eso, si imponemos a otros una cosa considerada civilizada, podría no encajar en esa determinada sociedad. Esta idea es lo que quisiera añadir a la opinión original del maestro Confucio.

El tercero de los aspectos a tratar hoy aquí tiene que ver con la idea de que para estudiar China hay que tener una

perspectiva desarrollada. La primavera pasada, el exembajador de Alemania en Beijing, Michael Schaefer, se me acercó en un banquete al que ambos asistíamos y me dijo: “Señor Mo, de acuerdo con los planes actuales del Gobierno chino, China podría convertirse en una súper potencia en 2050. Sin embargo, los problemas de corrupción, el grave desequilibrio entre los ricos y los pobres y la contaminación del medio ambiente crecen al mismo ritmo, lo que podría redundar en la destrucción de la sociedad china. ¿Qué opina sobre esto?”

Creo que me hizo una pregunta demasiado seria y que no debía ser respondida por un escritor como yo. A pesar de eso, decidí contestarle.

Le comenté que hace 37 años, es decir en 1976, todavía era muy joven. Mi gran sueño era poseer un certificado de empadronamiento en una ciudad en lugar de tenerlo en el pueblo, cosa imposible pues en aquel entonces no había libertad de movimiento. Hoy en día, cualquier persona puede residir en una ciudad si así lo desea.

Tengo un tío que vive en Taiwán. Debido a esto, durante tres años consecutivos, de 1974 a 1976, no aprobé el examen de ingreso en el ejército. Ahora es muy fácil viajar a Taiwán. En el pasado, en Beijing existía una prohibición por la que no se podía ni rodear ni contemplar a los extranjeros, mientras que ahora los hay a miles viviendo en la capital. Cuando era joven, me fascinaba ver un coche y lo perseguía con mi bicicleta, ahora cualquier callejuela está llena de ellos, y hay tantos que son un problema público. Una vez un chico de mi pueblo se fue de viaje a la ciudad costera de Qingdao y se pasó más de diez años hablando de ese gran acontecimiento, ahora la mayoría



de los chicos de mi pueblo trabajan en Oriente Medio.

Le dije también al exembajador alemán que hace 37 años nadie se podía imaginar que China se convertiría alguna vez en una potencia mundial. Es posible que dentro de 37 años los problemas que ahora le preocupan tanto a Michael Schaefer ya no existan. Tenemos que pensar que un pueblo que en 37 años ha logrado tantos avances, sea capaz de lograr muchos más en los próximos 37. Seguramente se resuelvan infinidad de problemas que hoy en día parecen muy difíciles de solucionar. El exembajador alemán asintió con la cabeza, aunque no sé si mis palabras le convencieron. El caso es que ya no volvió a mencionar este tema. Sigo pensando que le dije la verdad.

Cuando nos imaginamos el futuro de China y vemos la realidad actual, debe-

mos tener una perspectiva desarrollada. Solo así mantendremos el espíritu de optimismo cuando confrontamos problemas sin perder la fuerza luchadora.

Tengo otro ejemplo muy ilustrativo. Hace poco fui a la provincia de Yunnan para asistir a la XIII Feria de Arte Asiático. Allí me regalaron algo muy valioso, un CD sobre la situación y la vida de una minoría étnica en 1957. Por aquel entonces, todavía mantenían una vida muy primitiva. Así, vivían en cabañas muy sencillas y su lengua no tenía escritura. Toda la sociedad parecía permanecer anclada en la época feudal y continuaba siendo matriarcal con costumbres muy bárbaras. De este modo, cuando llegaba la época de hacer los sacrificios a los dioses, los hombres de esa tribu salían a cortar cabezas humanas y preparaban emboscadas como si fueran de caza. Quien lograra la cabeza de un barbudo,

se convertía en el héroe de la tribu, pues esa barba era símbolo de prosperidad, lo que aseguraba una buena cosecha el año siguiente. Sin embargo, cincuenta años después, esta minoría se ha sincronizado con el desarrollo de nuestra sociedad y ha completado la evolución social de miles de años, dejando atrás actos de este tipo. En el mundo actual, debido a la civilización, la ciencia y el progreso, se producen muchos milagros en la evolución social. Por supuesto, hay gente que pregunta por qué no mantienen sus viejas costumbres, así podríamos verlas. Creo que los barbudos se opondrían enérgicamente. Es broma, claro. Ejemplos reales como éste nos emocionan mucho, pues vemos que milagros así existen. Pienso que este tipo de ejemplos vivos pueden ser un buen material para que los Institutos Confucio enseñen la cultura china a los extranjeros.



Por último, quiero hablar del tema original de mi discurso: “El maestro Confucio en mi imaginación”. A lo largo de mi vida he visitado muchos Templos Confucio en diversos lugares, como Qufu (provincia de Shandong), Beijing, Kunming (provincia de Yunnan), Quzhou (provincia de Zhejiang) y Taiwán, entre otros. En todos ellos hay un retrato o una estatua de Confucio. Tiene una cara cuadrada, un par de cejas bien pobladas, una nariz chata, una boca fina con dos grandes dientes incisivos saliendo de ella entre los cuales hay una amplia brecha y lleva puestos largos ropajes. Al parecer, físicamente era un anciano así, de rostro serio. Pero, ¿cómo era Confucio en realidad? Después de leer varias veces su obra maestra *Las Analectas*, tengo la sensación de que los retratos y las estatuas no corresponden con el verdadero Confucio. Así que, ¿cómo era ese personaje tan enigmático?

De acuerdo con *Las Analectas*, Confucio era, sin duda, un hombre con muchos sueños. Ahora se habla por todas partes del sueño chino. Y Confucio también tenía el suyo, el cual consistía en construir un país similar al de la dinastía Zhou del Oeste (1066-771 a.C.), según se recoge en los reglamentos de Los ritos de Zhou. Pero en aquel entonces, este deseo parecía que era irrealista y obsoleto. Confucio también dijo que su sueño era que los ancianos vivieran có-

OBRAS DE MO YAN



《透明的红萝卜》
Perro blanco



《白狗秋千架》
El rábano transparente



《红高粱家族》
Sorgo rojo



《天堂蒜台之歌》
Las baladas del ajo



《酒国》
La república del vino

modamente, que los amigos se respetaran y que los niños crecieran con cariño y bien cuidados. Este arquetipo social era muy práctico e, incluso hoy en día, corresponde a las ideas de muchas personas y de nuestro gobierno. Pero creo que, en aquel momento, este sueño era muy difícil de cumplir. Por otro lado, Confucio abogaba por recuperar los ritos. No obstante creo que en virtud de los registros de *Las Analectas*, Confucio era un hombre con una mente flexible. A veces era muy práctico y realista. Leía reiteradamente el *Libro de los cambios*, que era un libro que hablaba de la fuerza existe en los cambios de las cosas. Nada que en el mundo se puede mantener sin cambiar. Sólo se puede progresar en el desarrollo humano adaptándose a los cambios de una forma positiva.

Confucio leía tanto el *Libro de los cambios* que las tapas de cuero atadas con bambú se rompían cada dos por tres. Eso significa que comprendía profundamente el espíritu de esta obra. Por eso, tenía una evaluación sobre la sociedad y las personas muy flexibles. En una ocasión, le comentó al ministro Guan Zhong del Estado Qi que un rey debía comportarse como un rey, un cortesano tenía que hacerlo como un cortesano, los padres como padres y los hijos como hijos, dejando bien claro que los subordinados debían obedecer a sus superiores y que los ministros debían obedecer a

su rey. Por aquel entonces, Guan Zhong traicionó a su señor y ayudó al duque Huan del Estado Qi. Cuando alguien le preguntaba si el comportamiento de Guan Zhong seguía las ideas de “compasión, benevolencia y virtud”, Confucio respondía: “¡por supuesto!”, ya que Guan Zhong ayudó al duque Huan a unificar algunas partes de China de tal forma que el nivel de vida de esas personas mejoró, lo que suponía toda una lección de compasión, benevolencia y virtud. Creo que la opinión de Confucio sobre la gente y los acontecimientos era muy flexible y apropiada, libre de estereotipos y fija en cuanto a juicios morales.

Las Analectas me dan la impresión de que Confucio era muy travieso y divertido. En el libro se menciona varias veces que le gustaba mucho cantar. Cuando escuchaba una bonita canción, pedía que se la cantaran una segunda vez y así se la aprendía. Al ser capaz de aprender una canción escuchándola dos veces, Confucio mostraba sus dotes para la música. Tendría que haber sido cantante o músico. Un hombre al que le gustaba la música y conocer a muchos amigos, ¿cómo podía ser igual que el anciano que vemos en los retratos de los Templos Confucio? Tendría que parecer más alegre.

En fin, me parece que Confucio tenía mucho sentido del humor y era muy alegre. No como el retrato tan serio y so-

lemne que hay en los templos. En realidad, era un hombre como nosotros, solo que superior en muchos aspectos. Por eso, en los Institutos Confucio del extranjero lo mostramos como un hombre vivo y no como a un dios. De este modo es más real y persuasivo.

En cuanto a la apariencia física de Confucio, también hay muchas versiones. Estos últimos días me he preguntado cómo sería el maestro en realidad. Según *Los registros históricos*, cuando nació tenía una hendidura en su cabeza, por eso se le llamaban Qiu, que quiere decir “montículo”. Algunos decían que tenía una frente muy prominente, otros que sus orejas eran muy largas, el cuerpo estirado y las piernas muy cortas. Los hay que aseguraban que medía 1.91 metros de altura, lo suficientemente alto como para ser en la actualidad un jugador de baloncesto. En mi opinión, nadie sabe la imagen real de Confucio. Así que busquemos a alguien de nuestro entorno para imaginarnos que Confucio se vería más o menos como esa persona.

Hace unos días, de repente me di cuenta que hay un hombre que se le parece mucho a Confucio. Se trata del recién fallecido expresidente de Sudáfrica Nelson Mandela. ■

(Discurso de Mo Yan en la clausura del VIII Congreso Mundial de los Institutos Confucio celebrado en Beijing en diciembre de 2013)



1995
《丰乳肥臀》
Grandes pechos,
amplias caderas



2001
《檀香刑》



2003
《四十一炮》



2006
《生死疲劳》
La vida y la muerte
están desgastando



2008
《蛙》
Rana